

旧上海:从钱庄到银行

张华

钱庄作为中国传统金融机构的一个主要类型,历史悠久,具有坚实的立足基础与各种优势条件,这是其他传统金融机构所不能比拟和超越的。钱庄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业已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组织制度和经营机制。特别是进入近代社会后,随着国内外贸易的日渐繁荣,钱庄致力于为本;国商人提供各种细致周到的融资服务,积极开拓国内金融市场,不但确立了它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不可替代的地位,而且培养了大批熟悉本国复杂的货币体制、了解各地计量单位和商业行情的金融人才。可以说,钱庄业对金融市场的拓展和造就的大批专业人才,是中国新式银行发展的前提条件之一。

近代钱庄、银号集聚黄浦

旧上海的钱庄大多聚集在黄浦区。当年,宁波路、天津路、北京路、四川路等几条马路是钱庄的集中地,马路两旁挂着各式各样的钱庄招牌。即使在这些马路两旁的狭小弄堂里,也是钱庄林立,如天津路的福绥里、同吉里、鸿仁里;宁波路的兴仁里、同和里、永清里;北京路的清远里等。仅在兴仁里这条不长的里弄中,就挤挤插插布满了 11 家钱庄,可谓“夹缝中求生存”。虽然钱庄规模有限,设备简陋,操作方法陈旧,而当时已经出现的洋商银行则资本雄厚,似乎难以与其相抗衡。但钱庄在旧上海“小车不倒只管推”,仍然稳步经营,经久不衰,可见一定历史条件下,钱庄有着顽强的生命力。

19 世纪 20 年代,在沿海地区,特别在五口通商地,钱庄、外国银行、本国银行一度成三足鼎立之势,其后钱庄地位渐次被银行所取代。1933 年实行废两改元后,钱庄在银两、银元和兑换业务上的好处所剩无几;加上金融垄断资本挤压,钱庄更现困难,到抗战时期已经奄奄一息。1945 年抗战胜利后,钱业又重燃起发展希望。

1947 年 10 月 16 日,上海、南京两地钱业发起在南京介寿堂举行“民国钱商业同业公会联合会”成立大会,但不久,随着内战的爆发,钱庄每况愈下,除在中小城市和农村还有信用活动外,在大城市仅能苟延残喘。上海解放后,钱业于 1952 年底并入公私合营银行。

近代上海的钱庄组织

近代上海的钱庄组织,经理总握钱庄全权,并设协理或襄理一二人予以辅助。有时在经理之上,还设一督理,督理由股东委派,专司监察经理行为的职责,并参与决策。

钱庄职员按职责划分,大致可分为“八课”,即所谓“八把头”:一为“清账”,专管账务,凡一切编制月结、年结,决算盈亏,计算利息等事务都由他管。二为“客堂”,专管庄内接应宾客及一切庶务。三为“汇划”,掌管会计事务,专任考核存欠,记录账目,管理出纳,查核票据等。“汇划”之下还设“进出水”一人,专管元宝收解。四为“钱行”,又叫“市场员”,专管市场拆银,买卖银元等。五为“跑街”,专管在外承揽生意,是借贷来往的居间人,兼作对客户信用调查,如调查客户的身家、营业、财产等。六为“洋房”,专管银洋、钞票的出纳以及洋款账目的记录。七为“银行”,专管与各银行拆款来往等业务。八为“信房”,即文书科,专管书面来往文书等。

以上“八把头”的位置顺序,各庄互有差异,如平时缺银的钱庄,“钱行”就显得最为重要;有巨额存款的钱庄,“跑街”最为经理倚重;而在银行方面常有巨款可以通融的钱庄,则“银行”的地位居“八把头”之首。

“八把头”之外,还有所谓“栈司”,俗称“老司务”,专管送银、送票、跑银行、打回单等

事务。学徒或练习生则专管收票、抄录、传递等杂务。

外国银行的作用和影响

鸦片战争后，上海辟为国际通商口岸，洋商银行相继在沪登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钱庄与外国银行之间并没有直接的业务来往，后来发生的密切联系，完全是借助于外国洋行的媒介作用。

外国商人来华设立洋行从事贸易活动，与未打交道的中国商人做生意，必须依赖于一种信用制度。由于洋商银行在我国内地缺少分支机构，天地两不应，洋行买办深入我国内地推销洋货或收购物产，都要通过各地的经销商，而洋行对各地经销商的信用两眼一抹黑，外商对来自各地的华商并不那么信任，“不敢先交货后收款”，交易往往处于停顿状态。这对外商不利，他们开始寻找打破僵局的办法。而利用中国原有的信用制度加以合理调整和改造，使之适应新的社会经济环境，便成为一种切实可行的办法。

跨越地界的买卖，全凭信用，因此必须请出八面玲珑的钱庄为之担当中介的重任。于是洋商试探着与当地钱庄接触，愿意接受庄票作为结算工具。在这种前提下，中国钱庄早已有之的庄票制度得到外国商人的承认和利用，一种以信任为基础的洋行与钱庄的新型业务关系便顺理成章地建立起来了。譬如经销商为洋行推销 10 万两银子的洋布，由经销商请其钱庄签发一张 20 天期的庄票，洋行收到庄票就介入洋商银行，并将货物发给经销商，经销商卖出货物收到货款后立即归还钱庄的贷款。所以经销商推销洋货向钱庄申请贷款，乐于付出较高的利息和手续费，钱庄坐享其利。这般周而复始，钱庄信守承诺，经销商气定神闲，洋行买卖畅行，是谓三方共赢，皆大欢喜。难怪乎气势汹汹的洋商银行也不敢看轻钱庄，不得不与之“攀亲结缘”了。钱庄庄票名声漂洋过海，至今伦敦大英博物馆中还陈列有上海福康钱庄的一张庄票。

柳暗花明——本土银行风潮起

当然，本土钱庄兴盛一时，并不能成为诊治社会经济病症的灵丹妙药，随着西方银行经营理念的渗透，中资银行的推出，也就变得“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考量中国近代史，最早向中国人介绍西方银行的大概要算和林则徐同时代的魏源了。1847 年他在《海国图志》中就向中国人打开了金融的一扇窗，介绍了英国的英格兰银行和其他的商业银行，并解读了英国的债券、银行券以及银行存放款和汇总等业务活动。那时，魏源还未提及到银行两字，他只是把英文中的“Bank”翻译成“银局”。差不多与此同时，英国商人在上海建立了中国第一家外资银行，这家银行原名丽如，其优雅犹如淑女一般，但是它做的生意当中，有一大宗却是鸦片。

无独有偶，最早留学美国的容闳也曾向太平天国提出了七条建议，其中第五条是“创立银行制度及厘订度量衡标准”。容闳将银行看成是一种新的制度，这是“吃洋面包”的经历给他带来的切身体会。这些建议虽然由于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而未能付之现实，但倡办中资银行的星星之火，因为商业和流通的呼唤，特别是受外国资本在华开办银行的刺激而开始思想的燎原。1892 年，著名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郑观应提出了创建银行的条议。在他看来，“中国钱庄资本二三万，放款数十万，稍有倒欠，呼应不灵……子为今之计，非筹集巨款，创设银行，不能以挽救商情而维持市面也。”这是 he 看到旧式钱庄资本经营的弊病后，提出的以创办新式银行来挽救商情市面的设想。同时，他还连珠炮似地历陈开设银行的十大好处，诸如“聚通国之财，收通国之利，呼应甚灵，不形支绌”，“国家有大兴作，如造铁路、设船厂，种种工程可以代筹”，等等。

中国人自己银行的出现，比外资银行晚了整整五十年。1897 年 5 月，由洋务派官僚盛宣怀创立的中国第一家银行，亦建立在上海外滩，起名为中国通商银行。第二年即发行纸币。中国通商银行的英文行名开始为“中华帝国银行”，此银行的官方性质由此可见一斑。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私人资本银行，当推 1906 年在南市大东门外万聚码头开办的信成银行，其股东为华人富商和海外归来创办实业的游子们。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李鸿章、盛宣怀等人积极筹办中国通商银行的同时，“海归派”容闳更显开阔的思路，坚持先创办国家银行。为了向中央政府力陈己见，容闳广引博证，大展身手，“啃”

下了 1875 年美国法律中有关国家银行法的资料。按照容闳的美好蓝图，政府先筹集 1000 万两白银作为国家银行的开办资本，其中 200 万两用于购置各种机器，重印制国债券及钞票，铸造银币，另外 200 万两用于购地建屋，其余 600 万两则存在银行库中，用以购买金银铜等贵金属，铸成各种货币，流通全国。容闳还主张仿效美国，“向美国财政部商酌此事”，“调查设立国家银行最良之法”。但是，容闳的国家银行计划，终因中国通商银行的面世而寿终正寝。